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5.009

关于亚洲文明的历史哲学思考

钱乘旦

(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66)

摘要:任何文明若想延续,都需要有两个载体:一是精神的载体,即宗教或非宗教学说,构成了文明的意识形态;二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力量,构成了文明的制度保障。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缺一不可,否则文明就无所依赖,站立不稳。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最早把文明的精神载体(孔子学说)和政治载体(帝国结构)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目前,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上,只有依靠所有文明的共同努力、携手共进,才能解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关键词:亚洲文明;精神载体;政治载体;共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B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5-0059-04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四大文明发源地有3个在亚洲,第四个(尼罗河文明)也在亚洲和非洲的交接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亚洲养育了人类的文明,没有亚洲就没有文明。在亚洲这块土地上不仅产生了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两河文明这些名闻遐迩的远古文明,就连欧洲最早的古代希腊文明都和亚洲脱不了干系:希腊文明来源于“东方”,来自亚洲,西方的教科书上都是这么说的。亚洲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宗教的发源地,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都是在亚洲产生的,而其中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被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宗教,拥有人数最多的信徒。

最早的农业出现在亚洲,而农业的出现直接催生了人类文明。大麦小麦、红豆黄豆、稻谷黍稷、甘薯芋头这些人类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都是亚洲栽培的结果,而马牛羊猪等蓄养家畜也都是在亚洲被驯化然后流向世界其他地方的。在几千年时间中,亚洲是全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在农业时代,亚洲一直领先于世界,创造着辉煌的农业文明。亚洲的草原和沙漠孕育了草原文明和游

牧文明,这些文明与农耕世界的交流和互动,曾一次又一次震撼世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商业也是亚洲的骄傲,数千年中,中国的商业、印度的商业、波斯的商业、阿拉伯的商业、中亚的商业都很发达。正是这些商业编织了古代最重要的世界商业网络,其标志就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当时人们所知道的世界,即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在一起。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直到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时一直是这样,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正本清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时,世界上存在着4个文化圈,其中3个在亚洲,它们是东亚文化圈(以儒学思想为核心)、南亚文化圈(以婆罗门教—印度教为核心)、西亚北非文化圈(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第4个在欧洲,即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化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西方”又分成两部分,东面是东正教部分,西面是天主教—新教部分;西方人眼中的“西方”其实只是西面那个部分,东面那个部分并没有包含在内。在人类文明史上,“东方”3个文化圈一直比“西方”那个文化圈发展得更充分:生

收稿日期:2020-05-20

作者简介:钱乘旦(1949—),男,江苏常州人,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主要从事世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

产力水平更高、生活更加富裕、社会组织能力更强。即使在“西方”,东面那个部分也比西面那个部分发展得更充分:拜占庭帝国远比西欧要富裕,而拜占庭的物质基础恰恰在亚洲,丢掉了亚洲,拜占庭也就没落了。在几千年的时间中,“东方”发达和“西方”不发达是一种常态,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

四大文化圈各有优劣,取决于文明的两个载体的相互关系。任何文明若想延续,都需要有两个载体:一是精神的载体,即宗教或非宗教学说,构成了文明的意识形态;二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力量,构成了文明的制度保障。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缺一不可,否则文明就无所依赖,站立不稳。通观资本主义生成之前的世界各大文化圈,我们发现两个载体的关系决定了文明的强弱:它们相互支撑、彼此衔接,文明就生生不息、长盛不衰;倘若有一无一、或搭配不当,文明就发育不全、难以以为继。用这个标准观察资本主义之前的四大文化圈,可以看到以下情况:

欧洲一直没有形成两大载体的有机搭配,希腊时期既没有完整的国家(只有城邦),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罗马时期形成了强大的帝国,却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等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即将形成时,罗马国家却解体了。中世纪的西欧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却丢掉了“国家”,封建领地瓦解了社会。由此我们看到,在有文明覆盖的地区,西欧的发展是最不充分的,原因在于文明的两大载体一直处于跛脚状态,中世纪所谓“上帝和恺撒各司其职”就是这种情形的经典概括。

亚洲的情况各有不同。南亚的特点是意识形态早熟,统一的国家姗姗来迟。印度河流域曾经有过远古文明,后来雅利安人到来,消灭了原有的古老文明,带来了种姓制度和建立在种姓制度上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婆罗门教/印度教。精神的载体是强大的,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然而在政治方面,南亚次大陆长时间小国林立,有数百个地方政权,彼此征战不息,政局动荡不已。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结构的超常稳定是印度文明的特色,这使得印度次大陆经常遭受外来的入侵和统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一层文化隔膜,政治载体

和精神载体往往不相融。政治上的真正统一要到英国征服印度才出现,所以在南亚,精神载体的强大和政治载体的相对弱势很明显。

西亚—北非的特点是文明出现早、文明的形态定型晚。人类文明的曙光出现在两河流域,但历经几千年,仍未能凝结成特定的文明。远古时期,这里出现过一批地区性霸权国家,比如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但这些地区性霸权国家都是昙花一现,不同的人群进进出出,不同的统治者新老交替,希腊人和罗马人都统治过这个地方,战争和动乱是这个地区的常态。政治的混乱和意识形态的缺失使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形成固定的文明形态,直至伊斯兰教兴起,才导致强大的宗教信仰和强大的国家几乎同时出现,并且高度对接。从这个时候起,一个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圈才在西亚—北非形成了,其强大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现在。

相比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最早(公元前2世纪)把文明的精神载体(孔子学说)和政治载体(帝国结构)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孔子生活在动荡的时代,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他因此希望回归秩序,恢复和平,因此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将人和自然都置于其中。这套学说倡导和平、反对战争,颂扬公德、反对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而帝国的结构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社会的稳定,它与孔子学说的结合,形成了文明两大载体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关系,古代中国在整体发展方面的长期领先,不得不归功于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的高度结合。

总之,两大载体的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的生存能力,西欧在这个方面表现最差,直接导致了“东方”的领先和“西方”的落后。

但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格局。西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欧陷入封建状态,其特点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全面分解,导致近一千年的总体落后。但中世纪晚期开始,西欧进入重新整合的过程,封建领地在专制王权的强行压制下按地

域整合,形成一个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它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政治载体和精神载体由此衔接,在西方开启走向现代的步伐。在民族国家的扶持下,一种新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兴起,资本是它的轴心,市场是它的动力,工业和商业围绕它旋转,科学和技术是它的工具。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牵引机,整个世界都被它拉着走。“西方中心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普世”之说也由此而产生。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的霸权神圣化,把西方说成是世界的发展方向。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存在了,西方要独吞世界。这种叙事方法在黑格尔那里就很清楚,到福山那里就成了“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亚洲沉沦了,它无法抵御西方的冲击,古老的文明被蒙上殖民主义的阴影。

殖民的历史是血与火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入侵,到20世纪开始的时候,亚洲已经被整体征服,古老的国家纷纷瓦解,古老的文明危机四伏。面对西方的冲击,亚洲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绝境逢生,要么万劫不复。汤因比说:挑战与应战是文明生存的机制,决定着文明的生死存亡。且不论这种理论是否正确,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就在西方霸权登峰造极、众多文明存亡危殆之时,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形成了,这个运动叫“现代化”。文明复兴的过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复兴的工具恰恰是“现代化”。通过现代化,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而追赶西方,迅速跻身于现代世界。21世纪开始时,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已取得巨大成就,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正在到来。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亚洲凤凰涅槃,成为文明复兴的亮丽风景线。亚洲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又迅速发展自身经济,努力完成现代化。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亚洲彻底改变了面貌,古老的文明之光又一次大放异彩。

今天我们看亚洲,这是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从东亚到西亚,从北冰洋到印度洋,到处生机勃勃,到处在追求发展。亚洲这一块文明的故土已经从几百年的沉睡中醒过来,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就好像汤因比在那个著名的比喻里所说:沉

睡的人们睡醒了,开始了重新攀登文明高峰的艰难历程。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转变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几乎都是古老文明的核心区: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伊朗、阿拉伯……它们代表着前资本主义时代亚洲古代文明的后继,体现着文明的故乡正在复苏。亨廷顿显然注意到这个现象,因此他不认为历史会终结,相反,他认为古老的文明正在新生,他因而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今后世界的主旋律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保证西方能在这场冲突中胜出,他提供了一整套战略思考方案。

但亨廷顿和其他西方战略家一样,其基本思路是“零和游戏”:一方的赢,是另一方的输;一方得分,另一方必失分,输赢相加等于零。然而,能不能换个思路:双赢或多赢,各方都不输,各方都得分?这就是东方的智慧,按中国人的说法:兼收并容,共生共荣。地球之大容得下多种多样的现代文明,现代化正在塑造丰富多彩的现代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亚洲的古老文明获得了新生,它们恢复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曾经被西方霸权扭曲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正在被重新扭转,我们看见了“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间的关系重新平等;“回归”也意味着人们更多地思考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用传统的智慧去解决现代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自由与约束的关系,等等。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上,只有依靠所有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共同努力、携手共进,才能解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亚洲承担着新的使命。亚洲,这个在人类文明的创始期曾点亮文明之光的地方,在人类文明的成熟期,将高举文明的大旗,为人类贡献东方的智慧。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东方智慧的一大结晶。如果我们知道各种文明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如果我们知道地球只有一个,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只有共荣才能共存;如果我们知道文明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在世界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时,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双赢多

赢——那么,地球这个人类家园才有可能繁荣,才有可能持续。作为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数量最多的一个洲,亚洲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承担这个责任,我们要努力推进亚洲研究。中国身处亚洲,是东亚大国。我们周边有许多国家,它们是我们的邻居。它们各有其文明形态,各有其特殊国情。亚洲因历史悠久、地域广

阔、人群多样和文化丰富而充实着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但我们对亚洲的研究却是不充分的,需要花大力气努力补充。在今天世界正发生重大变局的时刻,研究我们身处的亚洲有着特殊的意义。

(本文是在浙江大学“亚洲文明学科会聚研究计划”启动仪式上的主旨发言,作者钱乘旦,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历史学教授。)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Asian Civilizations

QIAN Cheng-d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6, China)

Abstract: The continuation of any civilization depends on two carriers. One is a spiritual carrier, that is religious or non-religious doctrines, which constitute the ideology of civilization; the other is a political carrier, that is national power, which constitutes the system guarantee for civilization. The spiritual carrier and the political carrier are indispensable, otherwise civilization will have nothing to rely on and become unstable. What is special about China is that it first combined the spiritual carrier of civilization (Confucianism) and political carrier (imperial structure) to form a perfect connection between ideology and the country, which is unique in the world. Currently, in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only by relying on the joint efforts and progress of all civilizations, i.e. the Ea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can the common issues fa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 solved.

Key words: Asian civilizations; spiritual carrier; political carrier; mutual development

(责任校对 朱正余)